

趣说中国历史

(五)

三思 主编

目 录

汉武帝求仙	1
司马相如赋《上林》	6
汉赋的兴盛	9
司马迁修《史记》	13
汉武帝平南越	20
李广利征大宛	23
李陵降匈奴	27
巫蛊之祸	30
李广利降匈奴	35
武帝下诏罪己	38
西域设汉官	41
苏武牧羊	44
汉征朝鲜	48
霍光辅政	50
燕王谋反	53
昌邑王之废	55
霍氏之灭	59
汉宣帝之立	63
黄霸治民	66
赵充国击西羌	69
酷吏严延年	73
酷吏王温舒	76
石渠阁会议	78
龚遂治齐	80
石显专权	83
萧望之之死	86

陈汤袭杀郅支	90
刘向父子整理古籍	93
今古文经学之争	96
五侯专权	101
赵氏姊妹专后宫	104
汉哀帝宠董贤	106
王莽篡汉	109
王莽改制	115

汉武帝求仙

汉武帝虽然雄才大略，英武过人，但也有其致命的弱点，即像秦始皇一样，企求长生不老，成神成仙，永享富贵，并为此耗费无数钱财，也闹出不少笑话。许多方术之士也乘机投武帝所好，施尽浑身各种解数行进欺骗以猎取富贵。

第一个骗取武帝信任的是李少君。李少君擅长祠灶神、食谷导引、益寿延年之术，并以此去见武帝。汉武帝对他十分尊宠。李少君本来在深泽侯赵氏家中主办方药，他将自己的真实年龄和生长之地隐瞒起来，常自称自己七十岁，能指使鬼物，却除衰老，以其方游遍诸侯。李少君孤身一人，没有妻子。人闻其能使鬼物及长寿不死，便争着馈遗他，因此，李少君的金钱布帛衣食吃用不完。不明真象之人见其如此，又以为李少君不治产业而富饶，又不知他是哪里的人，便更加相信他的鬼话，争着服侍他。李少君也有自己的一套奇术，善于巧发奇中，令人吃惊又猜不透。一次，在武安侯田蚡家中饮酒，坐中有一个九十多岁的老人。李少君和这位老人谈起当年和这个老人的祖父游弋狩猎之地。老人还是个孩子的时候，曾跟随祖父到过这些地方，依稀还记得一些，听了李少君之言，说李少君所言极是。于是，在座之人皆大惊。李少君见了武帝，武帝宫中收藏有一件古铜器，问李少君。李少君说：“这是齐桓公十年(前 676 年)在柏寝(今山东千乘)所用之器。”武帝使人案读铜器铭文，果然是齐桓公之器，于是一宫尽皆骇然，以李少君为数百

岁之神人。李少君对汉武帝吹牛说：“祠灶神则可以致物，致物则丹沙可化为黄金，黄金炼成之后以为饮食之器则可以益寿延年，益寿延年而海中蓬莱仙山上的神人可以见到，见了蓬莱仙人再举行封禅仪式便长生不死，黄帝便是如此。臣曾游于海上，见到了安期生，安期生让臣吃的枣，大的如甜瓜一般。安期生是个仙人，能到蓬莱仙山去，合则见人，不合则隐。”武帝听得神魂颠倒，便开始亲自祭祀灶神，而派遣方士入海寻求蓬莱安期生之属，而从事化丹砂和各种药剂为黄金之事了。

过了不久，李少君病死。武帝以为李少君是化去成仙而不死，派两个叫黄偁和史舒宽的方士学习李少君留下的药方。派出去求蓬莱安期生的人什么也未寻找到，而海上燕齐之地怪迂之方士多互相仿效，竟言神仙之事了。

第二个大骗武帝的是少翁。

少翁是齐人，以鬼神之方见汉武帝。武帝当时有一个十分宠爱的王夫人死了，少翁运起幻术，在夜里引致王夫人的身影和灶鬼的容貌，使武帝在帷帐之中遥遥地望见。武帝大信，遂拜少翁为文成将军，赏赐无数。不以臣子而以客礼礼之。少翁对武帝说：“陛下欲与神仙交通，宫室被服不像神，神物不至。”于是，武帝乃作画云气车，并在各种吉利的胜日驾车驱逐恶鬼。又作甘泉宫，宫中修建台室，里面画上天、地、泰一等各种神灵，摆上祭祀之具以致天神。过了一年多，少翁的各种方术都不灵验了，神仙并未到来。少翁为了塞责便写了一封帛书喂到买来的牛肚子里，假装不知道，说此牛腹中有奇。杀掉牛，划开肚子，得到那一封帛书，帛书上面的文字甚为奇怪，武帝看了之后有些怀疑。有人认出了少翁的

笔迹，一调查，果然是少翁伪造的。武帝大怒，便杀了少翁，而将此事隐瞒起来。

杀了少翁，武帝并未知错改正。不久，就又来了个栾大。

栾大是乐成侯丁义推荐给武帝的。栾大本是胶东王的家人，曾经和文成将军少翁拜同一个师傅学习方术，学成之后为胶东王炼方药。乐成侯丁义的姐姐是胶东康王的王后，没有生儿子。胶东康王死后，别的姬妾之子定为胶东王。康王王后行为不轨，和康王不睦，曾相互以法威胁对方。康王死后，康王后听说少翁已死，而想自媚于武帝，便派栾大通过乐成侯丁义向武帝献方。武帝杀了少翁不久后便后悔了，惜其早死而其方未尽用之。正在懊之际，忽见栾大到来，不禁大为高兴。栾大长得一表人材，说话多方略，好吹大牛皮，吹得连自己都相信。栾大对武帝吹嘘说：“臣曾经往来于海中，见到安期生和羡门等人。只是臣太微贱，他们不信任臣。又认为胶东康王只是个诸侯，不配用他们的仙方。臣数次告诉胶东康王，胶东康王又不用臣。臣的师傅说：‘黄金可成，而黄河决口可以堵塞，不死之药可得，仙人可致也。’但臣恐怕像文成将军一样又被杀死，那样则方士皆掩口而不敢谈，哪里还敢谈论方术？”武帝急忙掩饰道：“文成将军是吃马肝中毒死的。你若能重修其方，我还爱惜什么？”栾大说：“臣非有求于人，而是人有求于臣。陛下若定要引致神仙，便应贵其使者，令有亲属，以客礼待，勿使卑下，使各佩其信印，那样方可使通言于神人。即使如此，神人还不知高不高兴来。然必致尊敬之意于神之使者，然后可致神仙本人。”武帝心下狐疑，要栾大先试验小技以待观之。栾大利用磁铁吸铁的原理，让两枚

围棋子互相碰撞不止。武帝一见，不明就里，又大为相信。

当时，武帝正为黄河在瓠子(今河南濮阳南)决口，淹没山东大片地区，连年堵塞不住而犯愁。炼丹砂为黄金之术也未曾见效。听了栾大之言，便拜栾大为五利将军。过了一月多，铸成四个金印，分别是天士将军，地士将军，大通将军、天道将军，让栾大一齐佩在身上。并封栾大为乐通侯，赐列侯甲每次，僮仆千人，将自己用过的许多车马服御器都充实栾大之家，还将女儿卫长公主嫁与栾大作夫人，以万金为嫁妆，更名叫当利公主。武帝还亲自到栾大的家里去，使者存问所给，连属于道路。从武帝的姑姑和朝中将相以下，皆置酒于栾大之家，献遗财物无数。武帝又刻一印叫“天道将军”，派使者穿上羽衣，于夜间立于白茅之上，栾大也穿上羽衣，立白茅之上接受印信，以示不为天子之臣。佩“天道”之印，又含有为天子导天神之意。从此后，栾大经常于夜间在家中祭祀，欲以下神。据说，神仙并未到来，倒来了许多小鬼，栾大还颇能指使他们。不久，栾大又打点行装，东行入海，说要去找自己的师傅。栾大从见武帝到此时，仅有几个月，却身佩六印，贵震天下，引得无数人羡慕。而海边燕齐之地，方士们莫不扼腕而自言有神仙之方，能神仙羽化了。

栾大离开长安后，并未到海上去，而是上泰山转了一圈，祭祀了一番，便打道回府。汉武帝虽然宠信方术，然因多不见验，心下仍有些怀疑，见栾大到山东去，便派人在后面跟踪，将栾大的行踪都掌握得一清二楚。栾大却还不知，从山东回长安后，向武帝吹牛见到了自己的师傅，又得了什么仙方。但这些仙方多不应验。武帝

大怒，又将栾大处死。

齐人公孙卿，也对汉武帝吹过一通大牛皮。汉元鼎元年(前 116 年)，洒东汾阳(今山西河津县南)县境出土一只青铜鼎，特别大，且文镂款识古怪，人多不识，地方官以为祥瑞，把它献给武帝。武帝为此正式改元为元鼎元年。公孙卿伪造了一封假书，说是一个叫申功的人从神仙那里受来。武帝问申功是何许人，公孙卿说：“申功是齐人，与安期生通，受黄宙之言，无书，独有此鼎书，回‘汉兴复当黄帝之时。改之圣者在高祖之孙且曾孙也。宝鼎出而与神通，封禅。封禅七十二王，唯黄帝得上泰山封。’申功说：‘汉主也当上泰山封禅，上泰山封禅则能仙登于天。当年黄帝采首山之铜(首山在河东，即山西境内之中条山)，铸鼎于荆山之下。鼎既成，有龙自天上垂须下迎黄帝。黄帝上骑，群臣后宫跟从上龙者七十余人，龙乃飞去。余下的小臣不得上，乃悉持龙须，龙须脱落，黄帝用的弓也堕下来。百姓仰望黄帝既上天，乃抱其弓和龙须哭号，故后世因名其处回鼎湖，其弓曰乌号。’”武帝听得心迷神往，说：“嗟乎？我诚能得如黄帝，视去妻子如脱鞋耳。”便拜公孙卿为郎。

武帝求仙数十年，终未见效，又数为方士所欺，至晚年乃悟其前非。汉征和四年(前 89 年)，大鸿胪田千秋请武帝罢除言神仙事者，武帝听从，并常对群臣叹息说：“过去愚惑，为方士所欺。天下岂有仙人？尽妖妄耳？节食服药，方可以治病。”从此不再言神仙之事。

司马相如赋《上林》

司马相如是蜀郡成都(今四川成都)人，字长卿。少时好读书，学击剑，所以父母亲又给他起名叫犬子。长大后有了一点学问，十分羡慕战国时期的赵国名相蔺相如之为人，所以更名为司马相如。汉景帝时，以家赀为郎官，但非其所好。司马相如喜爱写文章，汉景帝却不好辞赋。景帝的弟弟梁孝王来朝见，手下的文人如齐人邹阳、淮阴枚乘、吴庄忌夫子等都是当时著名的文学家，司马相如和他们相见之后，十分投机，便借病去职，客游于梁。梁孝王令司马相如与诸生同舍。司马相如在此优游数年，写了一篇叫《子虚赋》。

梁孝王去世后，司马相如回到成都。此时家业已败，无以自业谋生。相如平素与临邛(今四川邛崃)令王吉私交很好。王吉想帮助司马相如，便让司马相如居于临邛城外的都亭，然后王吉作出十分恭敬的样子，每天都去拜会相如。司马相如也装出一副高尚的样子，开始还接见一下王吉，后来干脆称病不见，派从者谢退王吉，王吉却愈加恭谨。临邛当时是蜀郡的经济中心之一，有许多富豪，其中最有名的是卓王孙和程郑二人。卓王孙有家僮八百人，程郑也有家僮数百人。二人听说县令有贵客，为表示尊重，便具酒相召，不仅县令王吉前去赴宴，还有其他几百位客人。至中日，派人去请司马相如，相如谢病不能往。王吉见状，饭都不敢吃，亲自去迎请司马相如。司马相如装出迫不得已的样子，被县令强起前往赴宴，至后，众人见司马相如之风采，又高自称许，

不觉肃然起敬，一座尽倾。酒酣，王吉奉上一张琴对司马相如说：“窃闻长卿好鼓琴，请君弹奏一曲。”司马相如辞谢，弹了一两个曲子。当时，卓王孙有个女儿叫卓文君，刚刚死了丈夫。卓文君很喜欢音乐，司马相如知道后，便借着这个机会，用琴声向文君表达爱慕之情。司马相如虽然落魄，但到临邛来以后，有王吉的帮助，后从车骑，雍容闲雅，极有风采。卓文君早闻其名。等在卓王孙家饮酒，司马相如鼓琴，卓文君偷偷从门户观看，一下子为司马相如所吸引，并领悟到了司马相如琴声中的含意。罢酒之后，司马相如便派人重赐卓文君的侍从以通殷勤之意。卓文君之心早已许相如，见相如如此，便一天夜里从家中逃出，亡奔司马相如，司马相如带着卓文君驰回成都。但相如家中贫穷，徒有四壁，环堵萧然，卓王孙听说后大怒，不愿自己的女儿嫁给一个穷酸文人，说：“女儿至不材，我不忍杀之，但不给她一文钱。”有人劝卓王孙，卓王孙不听。时间长了，卓文君也过不惯穷日子，说：“长卿和我回临邛去，向我的兄弟借一点钱便足以谋生，何必自苦如此！”相如便和卓文君一同回到临邛，把车骑卖掉，在街上买下一间房子，开起一家酒店，卓文君当土卢卖酒，司马相如穿上下人的衣服，和雇来的工人一起干杂活，在市中洗涤器物，故意以此来羞辱卓王孙。卓王孙听说后，果然深以为耻，闭门不出。卓王孙的兄弟们劝他说：“你有一男二女，所不足者并非钱财。如今文君已失身于司马长卿，长卿是厌于游宦而归，虽然贫穷，但其人材足以为依靠，而且又是县令的客人，你难道连这点面子都不给吗？”卓王孙无奈，分给卓文君家僮一百人，钱一百万，以及以前出嫁时的衣被财物。卓文君便和相如回到成都，买田宅而

过起富人的生活。

过了几年，蜀人杨得意为狗监(主管猎犬)，侍侯汉武帝。一次，武帝读了《子虚赋》后，觉得写得很好，说：“朕独不得与此人同时哉！”认为该赋的作者是位古人。杨得意说：“臣的邑人司马相如自言此赋乃他所写。”武帝大吃一惊，立即诏司马相如进京，问有无此事。司马相如说：“是的。但《子虚赋》所赋乃诸侯之事，未必足观。请为天子游猎之赋，赋成奏之。”武帝答应，令尚书供给笔札。司马相如重新写了一篇大赋，叫《上林赋》。

在中国文学史上，汉代文学的代表性体裁便是赋。赋是一种半诗半文的混合体，其特点是“铺采摛离文”、“直书其事”，多以夸张的手法，板滞的形式，描写宫苑的富丽，都城的繁华、物产的丰饶、神仙、田猎的乐事以及帝王的奢侈生活，结构宏伟，语汇丰富，但缺少真情实感。赋家又喜用艰深的辞句、生僻的文字，按类罗列，有些作品几乎成为类书。汉武帝时期是汉赋的鼎盛时期，而这一时期的代表人物便是司马相如。虽然赋有许多缺点，但司马相如本人是一个富有文采和想象力的作家，他的赋除了结构宏伟，语汇丰富之外，也有许多描写十分深刻、十分形象的地方。如《上林赋》中有这样一段：“于是乎游戏懈怠，置酒乎昊天之上，张乐乎车马之宇；撞千石之钟，立万石之钜；建翠华之旗，树灵鼉之鼓。奏陶唐氏之舞，听葛天氏之歌，千人唱，万人和，山陵为之震动，山谷为之荡波。”

《上林赋》写成奏上以后，武帝读之大喜，拜司马相如为郎。司马相如为郎数年，武帝派唐蒙通使夜郎，发巴蜀吏卒转漕者一万余人，巴蜀之民大相惊恐。武帝听说后，派司马相如为使，前去责备唐蒙，并喻告巴蜀

之民以唐蒙所为并非上意。司马相如还报告，唐蒙继续南进，开通夜郎。通西南夷之道，作者数万人，数岁而道不成。士卒多死，费以巨万计。蜀民多言其不便。武帝问司马相如，相如以为若能开通，置为郡县便很有利。武帝以为然，乃拜相如为中郎将，建节往使，乘四乘之传车，因巴蜀之财物以赂西南夷。司马相如至蜀，蜀郡的太守以下皆出城郊迎，县令背负弩矢为先驱开道，蜀人以为这是无上的光荣。于是，卓王孙和临邛富豪都到相如那里，通过门下献牛酒以交欢。卓王孙喟然而叹，自以为让女儿嫁给司马相如太晚，便分给卓文君更多的财物，数量与儿子相等。

汉赋的兴盛

赋的特点是“不歌而诵”和“铺采摛离文并体物写志”，即不受音乐束缚，可以通过铺排材料来精确、细致而又广泛地描写事物，表达题旨。

汉赋的兴盛，首先与楚辞的广泛传播有关。汉朝皇帝是楚人，开国大臣亦多楚人，因而楚辞在全国传播。楚辞对汉赋的影响是直接和深广的。当时，中央有意识地把文士集中在朝廷。汉初，高祖、吕后、文帝、景帝皆不喜好文士，因而只有贾谊一人显名于中央，枚乘等人都被各藩国搜罗而去。武帝即位之后，以“蒲轮迎枚生”，延请四方文学辩说之士待诏金马门。严助、朱买臣、吾丘寿王、司马相如、主父偃、徐乐、严安、东方朔、枚皋、终军、严忽奇等，“并在左右”。文学之士逐渐由诸侯手中集中于朝廷，赋也随之进入中央。同时，赋的

创作也得到藩王和皇帝大力奖励。枚乘写《柳赋》，吴王赐绢五匹。司马相如赋《长门》，得到皇室一百斤黄金；又赋《上林》，得到高官。除此之外，武帝时还有东方朔、枚皋，宣帝时有王褒、张子侨，成帝时有扬雄，章帝时有崔马因，和帝时有李尤等人，都以辞赋得官。东汉时，献赋、考赋成为制度。张衡《论贡举疏》说：考赋取士，不管成绩好坏，一概录取，给以俸禄，写赋成了升官发财的敲门砖了。最重要的还是汉代经济、文化的发展为汉赋提供了优裕的条件。文景时代虽不大注重文学，但却大力扶助农业，减轻赋税，因而人民得以安乐，国库得以充实。所谓“京师之钱累巨万，贯朽而不可校；太仓之粟陈陈相因，充溢露积于外，至腐败不可食”，就是当时经济发展的写照。另外，文景时代虽好黄老而不好文学，然而正是黄老的无为而治宗旨的影响，才使统治者废除了挟书之律，而在文化思想上呈现出相对放任自由的局面，这对于后来的赋家从各方面积累知识，解放思想，从而形成铺排夸张、浩浩荡荡的宏篇大赋，是一种有益的帮助。

汉赋的崛起与流变过程可作如下叙述：汉初的赋家有陆贾、朱建、赵幽王、贾谊和枚乘等人。陆贾、朱建之作现已无存，赵幽王赋无文采，只有贾谊、枚乘二人。贾谊生于汉高祖七年（前200年），十八岁能诵诗书作文，二十多岁被文帝召为博士，一年中超迁至大中大夫。后文帝派他为长沙王太傅。在赴任途中他经过湘水时，想到屈原的身世和事迹，写下《吊屈原赋》。在担任太傅期间，有一天一只服鸟鸟飞入他的居处，他认为此鸟不祥，写下《服鸟鸟赋》。《吊屈原》在体制上继承《九章》，但前段连用铺排句，第二段多用反诘和感叹，形成铺张扬

厉的风格，具有战国策士雄辩之风。《服鸟鸟赋》则融合屈原《天问》的四言句式和宋玉《风赋》的问答和寓言特点。它是汉赋，也是赋史上第一篇成熟的哲理赋，也是第一篇较完整的以四言诗句为主的问答体赋。这种在形式上趋于散体化，大量使用四字句，句法比较整齐的赋，正是新赋体的特点，显示了从楚辞过渡的痕迹。枚乘前 140 年去世，他是吴玉凼的门客。《七发》设楚太子有疾，吴客前往探问，先与太子讨论病源，然后陈设奇声、奇味、骑射、游宴、校猎(检阅军队及打猎)、观涛等六事以启发太子，最后归于“要言妙道”，故称七发。此赋用问答体，全篇构思与战国游士说辞相似，但把诱导方法扩展了。他先猛喝一声然后开始诱导，从感官享乐说起，逐渐提高到健康、新奇的程度，至观潮达到极点，最后才引导其超越感官享受去追求更高级的精神享受。赋中对潮水所作的生动描写，超过了此前历史上所有作品。在描写的层次、传神，以及所用的比喻、夸张、形容词、重叠词和双声叠韵词之多，让人眼花缭乱，这正体现着汉赋在艺术发展上的新倾向，为后来的大赋作了准备。

武宣时代，汉赋进入全盛期。此时赋家像森林一般茂密，仅御奏之赋就“千有余篇”。《汉志》所载名家二十多人，处于宝塔尖顶的是大名鼎鼎的司马相如。司马相如生于汉文帝元年(前 179 年)，在一生六十二年中共写赋二十九篇，今存六篇。他先入赘为郎，事景帝为牙骑常侍，后托病去职，游于梁王门下，写出《子虚赋》。梁王死，在成都，与临邛卓文君结婚。适逢武帝读《子虚赋》感叹说：“朕独不得与此人同时哉！”狗监杨得意趁机把司马相如推荐给武帝。相如说：“此赋不过是诸侯

之事，我还可以写天子之事呢！”随即又写下《上林赋》。赋中假设楚国子虚和齐国乌有先生互相夸耀，最后亡是公又大肆陈上林苑的壮丽和天子射猎的盛举，声明诸侯之不足道和天子的伟大，最后归结为“解酒罢猎、与民同利”。司马相如以恢宏的气魄歌颂了大一统中央王朝无可比拟的声威，与西汉盛世相呼应，有很强的现实意义，亦达到汉赋的顶峰。此赋采用一浪高过一浪的手法，气势充沛，波澜壮阔。《西京杂记》说司马相如写此赋时，“意思萧散，不复与外事相关，控引天地，错综古今；忽然如睡，焕然而兴，几百日而后成”。此赋实在费尽司马相如的心血。朋友盛览问他作赋秘诀，相如说：“赋家之心，包括宇宙，总览人物，斯乃得之于内，不可得而传”。此话中所包含的气魄、才力，是空前统一和繁荣的汉帝国对民族心理的影响，及其在个体心理上的反映。汉赋全盛期的代表赋家还有武帝刘彻、董仲舒、司马廷、孔臧、枚皋、庄忽奇、严助、朱买臣、东方朔、王褒等人。元成以后，汉赋进入模拟期，此时的赋家、作品的数量很大，但在赋的内容和形式上没有什么新创造，气势上也相对软弱。其代表人物可推刘向和扬雄。刘向生于汉元凤四年（前 77 年），他曾向皇帝献赋几十篇，今存《九叹》最为知名。《九叹》模拟屈原的《九章》，虽身世遭际与屈原有类似之处，赋亦有感而作，但终嫌模拟气太重。扬雄生于前五三年，曾向成帝献《甘泉》、《羽猎》等赋。扬雄的大赋模拟倾向很严重，但他的一些小赋如《酒》、《逐贫》等赋却能上承荀卿，以诗体赋直接表白自己的内心世界和人生观，颇为别致而不落俗套。

东汉以后，赋仍在发展，名家也不断涌现，如班彪、班固、梁鸿、张衡、赵壹、蔡邕等都留下许多脍炙人口

之作，但其气势和内容都无法与前代作家相比，倒是在抒情小赋上有一些贡献。总之，汉赋在题材和技巧上有新的开拓和创造。它有人尚未充分注意的帝王宫廷生活的各个方面都写到了，下至奴婢，旁及山水。它铺张扬厉，用尽各种词语，力求在体物上下功夫，取得突出成就。

司马迁修《史记》

司马迁，字子长，西汉左冯翊夏阳(今陕西韩城县)人，生于汉中元五年(前 145 年)，大约在汉武帝晚年去世，是我国古代伟大的史学家、哲学家、文学家。他的父亲司马谈是一位颇有学识的史学家和思想家，汉建元、元封年间(前 140 年至前 110 年)任太史令，著《前家要旨》，同时，他还抱定了记载汉兴之后“明主贤君忠臣死义之士”的宏伟理想，据现在研究，证明他不仅已编撰出了一些汉史的篇章，而且有本纪、有列传、有“太史公曰”，已具备一定的著作体例和规模。司马迁幼年在家乡生活，“耕牧于河山之阳”，大约十岁时随父到长安，开始诵“古文”，曾跟孔安国学习过古文《尚书》，大约还听董仲舒讲过《公羊春秋》。他博通“六艺”，涉猎各种典籍及先秦诸子、“百家杂语”；精天文、律历、地理，并知医药、乐、占卜；喜文学，尤其推崇屈原、贾谊、司马相如的辞赋。二十岁的时候，他第一次远游，足迹遍及长江中下游地区和今山东、河南等地。返长安后，他作了郎中。此后，他还侍从汉武帝到过今山西、河南、甘肃、内蒙等地。汉元鼎六年(前 111 年)，他受命出使

“西南夷”。次年，从“西南夷”返回，见父于河洛之间，这时，司马谈因病留滞洛阳，不能从武帝封禅泰山，“发愤且卒”，乃对儿子倾吐了自己“欲论著”的宿愿，谆谆嘱咐司马迁踵其事业。司马迁俯首流涕，庄重地表示一定继承父亲的遗志。元封三年(前 108 年)，他继任太史令，遂能读到“靡不毕集于太史公”的“天下遗文古事”。于是开始积累材料，准备写作。汉太初元年(前 104 年)，他倡议改历并积极参加了这一工作，把汉朝沿用的已不准确的《颛顼历》，改为比较精密的《太初历》。此后，他才全力以赴正式开始了著述工作。汉天汉三年(前 98 年)，他为败降于匈奴的李陵辩护，触怒了武帝，被定了“诬罔主上”的死罪，于是“深幽圜圜”之中。司马迁“家贫”，“财赂不足以自赎”，又“交游莫救，左右亲近不为一言”。他认为，自己的著作“草创未就”，如果伏法受诛，犹如蝼蚁般死去，实在“轻于鸿毛”。他抱着坚持完成自己著作的崇高理想，毫无愠色地接受了腐刑，以免一死。这一奇耻大辱，使司马迁的思想发生了重大变化。受刑后不久，他被任命为中书令。他坚持著述，把自己全部的才学、见识和心血，都贯注于著作之中，终于基本上完成了开创我国史学新时代的不朽著作——《史记》。

《史记》原名《太史公书》。包括二十本纪、十表、八书、三十世家。七十列传五大部分，共计一百三十篇(卷)，五十二万六千五百字，是一部组织严密、内容宏富的百科全书式的通史。

《史记》包括的时代和记载的内容之广，是前无古人的，它上起传说时代的黄帝，下迄汉武帝，约三千年的历史。它所记载的地理范围，延伸到了今日我国的版